

神秘的香山专用电话局

在北京著名风景区香山公园内,有一处神秘的小院,原名丽瞩楼,是清代静宜园二十八景之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此处被命名为中共中央专用电话局,这里离毛主席驻地双清别墅步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香山专用电话局

1949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519号令,派华北邮电总局副局长成安玉为北平邮政管理局军代表,组成50余人的接管处,于2月8日正式接管北平邮政管理局;王诤则率电信接管部入城,全面接管国民政府北平军事、民用通信系统。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在这之前的3月9日,曾参与北平电信接管工作的中央机关电话总机班班长彭润田(后任香山专用局局长)突然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为中央机关驻地香山筹建专用电话局。接到任务当天,彭润田就立刻日夜兼程赶往香山。

春寒料峭,彭润田带领工作人员不分白天黑夜,克服物质资源紧缺、工作环境恶劣的不利因素,仅用了13天,便安装了西门子自动交换机150门,架设了中继线和临时专线,安装了小交换机,还扩充了部分郊区线路,实现了中央军委、中央各机关驻地的电话通信,共和国通信业开始在香山安营扎寨。

严格的通信纪律

周恩来抵达香山后第一时间视察了香山专用局。因为中央首长长期使用人工电话,早已习惯,而且用自动电话需要首长去记或查电话号码,不适应首长紧张繁忙的工作,因此周恩来建议电话局把自动电话改为人工电话。经过叶子龙、汪东兴、彭润田等人的努力,他们找到了磁石电话机,及时地为中央领导装上了人工电话。

当时祖国南方尚未解放,北平也解放不久,香山上空的国民党飞机还在不停地盘旋。据当年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回忆,严格的通信纪律让他们记忆犹新,每周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

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告诉亲友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监听领导同志的电话。

1949年4月21日,与国民党代表和谈破裂后,毛泽东和朱德通过电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南海专用局

1949年6月,随着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建设中南海专用局。根据办公厅的这一决定,北平电信局于1949年6月26日开始正式筹建中南海专用局。筹建工作同样是由中央军委三局电话队与北平电信局选派的机务员、线务员一起进行的。局内安装了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中继台、蓄电池,并迁入人工磁石交换机,敷设了地下和架空电缆。短短半个月,中南海专用局就得以建成。

随着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迁入市内,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专用局正式开通,香山专用局作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宣告结束。香山电话局的原班人马,随党中央进驻中南海。

开国大典的声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决定10月1日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周恩来把有关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及扩音设备方面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央军委总参三局局长的王诤。

电信职工不分昼夜在天安门地区为大会指挥部安装了200多部电话机,架设了四五十公里被覆线和数百公里的广播遥控线,以及一批无线电发信机。为了保证信号畅通、扩音器音质清晰响亮,从接收的国民党军用物资中,王诤特地挑选了两台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被称作“九头鸟”的高音喇叭,并亲自带人将扩音设备架设在广场两侧,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了多次试验。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庄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隆隆的礼炮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就这样通过有线和无线电波立即传送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周振龙 唐柳明

罗荣桓的“政治攻势”

1942年后,侵华日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们企图凭借局部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抗日军队。领导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提出今后的斗争“以政治攻势为主”。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普遍采用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瓦解伪军政人员。这些人,如果有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反之,就给他记个黑点,将来惩治他。抗日军民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死硬分子,坚决给予打击。根据地各分区还开展了“唤子索夫运动”,即先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经常召集他们开座谈会,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动员他们劝说伪军“身在曹营

心在汉”。另一种策略是,在伪军内部物色目标,与其交朋友,使其为我所用。对于一般伪军,抗日政府制定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伪军“归来通行证”。

这项工作无疑是成功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山东根据地就瓦解伪军7000余人。在对伪军进行“神经战”和“心理战”的同时,罗荣桓并未放松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当时,山东根据地有一大批日本反战人士和朝鲜反日人员。他们经常用日语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电话线路讲八路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他们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此外,每逢日本的传统节日,这些人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有力地促进了日军官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张岩松

一本“小字典”泄露清军秘密

1909年10月26日,指导甲午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杀身亡。伊藤死去30年后,他的生前遗著《机密日清战争》解密,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这部满载大量中国国家机密的著作,使人们终于明白日本人是如何处心积虑赢得甲午战争的。该书中开示了一件隐藏很深的历史秘密,即日本从开战前就已破解晚清驻日公使馆与晚清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日本人一直准确掌握清廷出兵朝鲜和战争赔偿谈判中的机密情报。

这场密电泄露,源于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时,一些北洋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一个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国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数字。日当局分析后,判定这是清廷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并通过译电

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廷电报密码。

密码本丢失一事,清朝军方竟无人上报。而在此后,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送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件照会,别有用心地将日文译成中文,长387字。次日,汪凤藻着人将这份照会用密码电报送日本电报局发往总理衙门。两相比对,日本外务省很快掌握了密码规律,清朝官员竟毫不知情。

当时被破解的密电码,作为日本最高机密仅限定几个当事人知道,绝大多数高级官员并不知情。尤其让日本政府窃喜的是,晚清政府居然继续使用公使馆已失密的电码本。以至于1895年李鸿章赴日进行马关谈判,还带着这套旧密码,其在和谈期间与北京的往返密电内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赔款的底线等,全部为日方所了解。 卢昱

抗战时期的“跑车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在来往于北平的火车上出现了大量跑车者。他们通过火车运输,将外地匮乏的商品从北平输送过去,同时携带回外地价格相对低廉且在北平稀缺的商品,在两端市场均得利润,促成地域间的互通有无。

1945年,有研究者估计,北平居民中约有10万至15万人以跑车为生,外地来北平从事跑车的可能更多。在天桥和朝阳门,人们可以听到山东、山西和河南等不同省份的方言,这些都是来北平跑车的。当时,日伪当局明令禁止跑车活动,尤其是粮食交易,每人携带粮食不得超过10公斤。因此,跑车活动都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中华周报》的记者曾深入跑车行业,亲身体验并撰写一系列报道,向民众展示了这一行业的艰辛状况。记者直言,“跑车,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生意,起早摸黑,挨打,受气,样样都要来得”。具体而言,跑车者将货物带上火车就是一大难题。在车站,那些被认为包袱过大的跑车者经常会被罚款,检票时也会受到重点盘查,而伪宪兵警察一旦看到值钱的货物便随意没收。监察者不允许乘客携带大量粮食上车,导致跑车者有时三四天都无法成行。为了登上火车,有些人铤而走险,例如有人干脆紧握扶手站在火车外面的踏梯上,一路忍受寒风。

即便成功登上火车,跑车者也要经历不断的检查和欺凌。为了规避检查,跑车者将货品藏在衣物、鞋袜等处,手中仅提着一个小包。从北平至张家口的路线上,南口、青龙桥等地还特别设立检查点,检查员常常以“军用品”的名义随意没收物品。为避免携带的东西被搜走,跑车者想了各种办法。例如,工人白玉璋利用在南口机务段工作的便利,将烟叶和布匹隐藏在机车的煤炭堆中,在返程时则带回小米和棒子面等。有记者发现,跑车者们都非常谨慎,为了隐藏盐类,有的缠绕在腰间,有的则用铅线绑附在车厢的架子或椅子上。很多时候,检查员无法彻底搜查,跑车者们常常能侥幸过关。

这种跑车活动反映出沦陷社会畸变下的城市经济状况,也显现出北平居民颇为特别的生存应对。 魏坡